

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



邵黎平

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

中国传统商人丛书 顾晓鸣 主编

海天出版社

粤新登字10号

责任编辑 朱 蓉
周 游(特约)
封面设计 邝文龙

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

邵毅平著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 深圳)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 8.5 插页 1 字数1700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42-834-4/G·222 定 价: 5.80元

《中国传统商人》丛书

总 序

顾晓鸣

在文人纷纷“下海”自救的当口，“商”和“文”、“商人”和“文人”的关系已经是一笔糊涂账了，这里一批文人竟还要不知天高地厚，编出关于商人的书来教育商人，岂不是更令人啼笑皆非了吗？幸好我们想起了在世界范围以“商”著名的犹太人的一则寓言：

“富豪与智者，何者比较伟大？”

弟子对此百思不解，遂问其师，其师断然答曰：“当然是智者！”

弟子闻言反问：“既然如此，为何学者和智者经常出入富豪之家，却未曾看见富豪眷顾智者之家？”

其师答曰：“徒儿们啊，那是因为智者聪明，深知财富重要。反之富豪徒拥财富，但却不知要向智者学习智慧。”

这种代偿和互补性的机制，其实是世间万物和文化的

奥秘之一。所以，真正的智者和学者从不讳言商，从不讳言钱，从不讳言发财致富。中国上古就出了个伟大智者司马迁，开世界先例在历史中为商人树碑立传，心理极其健康，无丝毫红眼、妒嫉和假道学，他向世界公然宣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上古又出了一个身为大商人却懂得向智者和学者学习智慧的伟大商人吕不韦。《史记》和《吕氏春秋》成为传统中国文化中“文”与“商”美妙关系的历史见证。

可叹如德国大学者韦伯者，一是太急于想凑一个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不懂中文，并且未曾出到中国，与中国商人和智者尚未真正交往过，结果无论对中国商人还是中国文人，多有隔岸看花的臆测和误解。更可叹我们中国人自己，一是急于同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国际”接轨，一是来不及细读自己的《史记》和《吕氏春秋》之类的文化典籍，以讹传讹，有时真的大错特错了祖先，对传统中国商人及其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同样不得要领。所以，单纯从书本上做学问和谋生活的人未免惊诧中国商人何以既有今日在全球的业绩，又有触目惊心大兴伪劣“商不厌诈”。越是幼稚地断言传统文化是重仁义礼智信而“抑商”的人，越是会大喊看不懂啦。

其实，随着中国商人和商业在全世界的崛起，外国人也正在惊呼对中国商人的路数看不懂了。所以，法国人最近翻译了《淮南子》，目的是通过对传统中国文化那些不同于腐儒陈词滥调的部分的学习研究，弄懂中国商人心理和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内在模式。进行这种工作的，有许多是

大公司大商人，这些人真是身兼智者的商人！

这样，无论为国人，还是为外人，在传统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凸显和勾勒出中国商人的本质，就成了最时新的任务了——《传统中国商人的精神弘扬》、《传统中国商人的贾道透视》、《传统中国商人的心理分析》、《传统中国商人的智谋解构》、《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化洞察》和《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等，这些就是我们精心设计的视角，把中国文献和文化事项(例如故事、人物、谚语和象征物等等)所体现的商人，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解析，以显示传统中国商人丰富复杂多重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无需武断，只要把传统中国商人的方方面面亮出来了，今日的中国商人也许会突然洞达自身，因为我们总是传统商人的后代；今日的学者也许会对讨论已久的话题顿生新见；一般读者和外国人则可能因“我看得懂啦”而喜形于色。不管怎么说，也不管可能有幼稚、粗糙甚至不妥之处，这套书所代表的工作具有开先河的意义。中国传统商人课题的提出，使素来“目中无人”的商业研究和叙说走向活生生的人的活动；使“目中无商”的文化研究补上了不可或缺的另一侧。这一点非同小可，因为坊间许多洋洋洒洒的“中华文化史”，文中无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仿佛只有时至西方商人借坚船利炮打碎国门，乡土的传统文文化之数千年历史行将终结，国人不得不用某种形式以西方文化为导向时，才有“商品”与“炮舰”和“西学”一齐进来。仿佛古代中国文化中无商业、商品和商人的一席之地，更不必谈深入探讨作为文化之经济基础重要部分的商业和商

人对传统文化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了(例如在中国小说戏曲中这点特别明显)。因此,《中国传统商人》丛书提出的“文”与“商”的相互关系和商人所体现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又一深层结构,负载起文化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当代重大课题;《中国传统商人》丛书传播的传统中国商人积极的精神、德性、智慧和行为型式,充当着当代人生活技能增加和心理素养提高的催化剂。

不懂商人和财富的智者不是真正的智者;真正智慧的商人是经常眷顾学者之门的商人。如果因为商人太忙,或者因为学者太忙,大家还无暇见面的话,那么——

让商人和学者先在《中国传统商人》丛书中见面吧。

顾晓鸣 识于上海离斋
1993年7月1日

《传统中国商人》丛书总序	顾晓鸣
前言	1
第一章 历来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	5
同情	7
非难	12
肯定	18
第二章 士商关系(上):士人上位	22
傲慢与自卑	22
婚姻观上的表现	30
士商互济	42
第三章 士商关系(中):商人上位	50
盐商的气势	50
士人的投降	55
士人的抵抗	60
第四章 士商关系(下):士商对流	66
弃儒为商	66
亦儒亦商	72
由商人儒	77

第五章 商人、女人和士人	83
唐代诗歌:隐而未显的幻想	84
元代杂剧:幻想的现实化	86
明代白话小说:新的角逐	91
清代文言小说:喜剧化的幻想	97
第六章 商人的社会处境	101
皇权的干涉	102
官吏的欺压	106
无赖的骚扰	113
商人的应变	117
第七章 商人的危险	121
路上	121
舟中	128
黑店	131
黑寺与黑渡	135
第八章 商人的理念与实践	139
商人的养成	140
敬业精神	147
风险的考验	158
第九章 商人的拜金主义	163
唯钱是图	164
钱上取齐	166
金钱排座次	170
悔罪意识	172
第十章 理想的商业原则	176

现实的	176
幻想的	182
第十一章 商人之爱	186
娼楼妓馆	187
“两头大”	191
偷情至上主义	196
金钱买爱	201
第十二章 商人的女人们	211
等待	212
红杏出墙	217
覆水重收	225
自我牺牲	231
第十三章 商人的幻想	233
发财	233
艳遇	238
得助	243
发财、艳遇与得助	247
第十四章 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	252
关于海外贸易的描写	253
由海外贸易所产生的奇谈	257
海外贸易与发财梦	260

前 言

当我写作本书时，我正寄迹于远离祖国、远离家人的异国他乡，一个人过着紧张充实而又孤独寂寞的日子。我好像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的异国他乡的世界，一个是想象的传统商人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似乎没有任何联系和共同点；除了它们对我来说，都是既陌生而又令我好奇之外。

然而渐渐地我发现事情并非如此，无论在日本、在韩国，还是在其他地方，我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现代商人。他们或者拥有自己的小小的公司，或者从属于世界闻名的庞大商社。他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称呼是businessman。他们大概也是世界上最为忙碌的人，一般认为正是他们在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轮子向前转动。要说我在异国他乡感受最深的，就是现代世界简直是一个现代商人的世界。

对于这个世界我自然是深感陌生的，但是我又有强烈的想要了解它的好奇。当我试图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我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能够给予我们启发和帮助。现代的各

个国家的商人们，他们也分别从属于各自的悠久的商人传统，尽管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用着不同的钱币，有着不同的习惯，但在现代商人与传统商人之间，仍然有着许多基本的相似之处。我深深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个传统商人的世界，通过传统的联系与纽带，仍然还活在现代商人的世界里。对于过去的传统商人的世界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现代商人的世界。

与此同时，我关于现代商人们的所见所闻，我对于现代商人世界的感性认识，在我探索业已消逝的那个传统商人的世界时，也能提供许多启发和帮助，使我更容易感受传统商人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希冀与悲伤，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不仅如此。由于现代经济对于商人的越来越多的依赖，由于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现代关于商人的观念也已不同于以往。这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商人观念，对于我们穿透传统偏见的迷雾，更真切地认识传统商人的世界，无疑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这样，我所同时生活于其中的这两个现实的和想象的世界，对我来说便不再显得陌生而又无关。我深深地感觉到，一种隐蔽而又伟大的纽带把所有世界联系在一起，超越时代，超越国度，超越语言。在本书里，我试图用自己拙劣的手笔，把这种感觉表达出万一。

在本书中，我们把范围只限定于传统商人，也就是那些生活在古代社会里的商人，而没有涉及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里所出现的买办之类新型商人。这是因为他们与传统商人相当不同，需要用另外一本书来加以讨论。

本书所涉及的，只是文学如何表现商人的问题，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商人如何影响文学的问题，则我们也同样不拟涉及。虽说这两个问题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在性质上却仍然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我们把后一个问题，也留给我的下一次机会。

本书的取材范围，本想网罗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但在实际操作时，却发现要在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得不收缩我们的“野心”。现在的主要取材范围，限于每个时代的代表性文学样式。从先秦到唐五代，主要是诗歌、散文和文言小说，几乎已网罗殆尽；宋金元主要是话本小说和杂剧，也已网罗殆尽；明清主要是通俗小说，已涉及主要作品。这样的取材范围，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宋以后的诗歌散文不重要，也不是意味着明以后的戏曲不重要，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罢了。

当然，综合考察以上各种文学样式，我们会发现它们的重要程度，并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依表现商人的擅长程度而言，它们的重要程度大抵按长篇小说、短篇白话小说、戏曲、文言小说、诗歌、散文的顺序排列。这个排列顺序，正好大致跟这些文学样式在文学史上出现的顺序相反，这也许正说明了，对于商人的表现，随着文学样式的进步而越来越进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所确定的上述取材范围，也许也自有其合理性了。

从时代上来说，中国文学表现商人的历史，虽说可以远溯至先秦时代，但可以说直到唐五代以前，商人都一直是文学中的隐身人，处于隐而未显的状态；在唐五代，则由隐身

人上升为配角，处于半隐半露的状态；而直到宋以后，尤其是在明清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势力的增强，才愈来愈引起文人的注意，并大力加以表现。商人遂由隐身人和配角一变而为明星，成为各种文学样式中的重要主角。因此，虽说我们所写的是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但是其事实上的重点和大部分的篇幅，自然势必要给予宋代以后的文学，也就是所谓的“近世文学”或“前近代文学”。不过尽管我们的重点是在宋代以后，但我们仍将时刻留心整个文学史的宏观背景，以及此前各个时代的重要特征。

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既然是出现在文学中的，既然是由文人来表现的，那它就必然会罩上文人偏见的迷雾，投上文人心理的光影。指出这种偏见的迷雾与心理的光影，对于真切而客观地认识商人世界，无疑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在本书中我们将随处加以注意，并且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章节来处理它。

在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始终得到顾晓鸣先生的关心，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又是初夏时节了，校园里玫瑰花正在盛开。在它们的陪伴下写完了此书，我的心里感到了一丝慰藉。

邵毅平

1993年6月11日于韩国蔚山大学寄寓

第一章 历来文学对于商人的态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中，商人一直被置于最末一位。“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便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除了少数异端的存在(如司马迁)，也大抵是“重农轻商”，甚或“重农抑商”的。出现这样的现象和思想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立国，中国传统文化也主要是一种农业文化。这种历史条件和情况，本来就和西洋的一些国家，如地中海周边国家，以贸易立国的情况和条件不同。“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几千年来一直是困扰着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

然而，这只是理论上和原则上这么说，一旦进入实际的社会生活，事情就不那末简单了。尽管有“士农工商”的社会观念和“重农轻商”的经济观念，但在实际上，“商”由于其往往能够赚到更多的金钱，从而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和人们心理上，也往往能够享有比“农”和“工”更高的地位，有时甚至还会向“士”的地位挑战，尤其是那些未能进入统治阶层的“士”，而“农和“工”则从无能力和机会这么做。一般的社会观念，往往并不是

根据人们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和重要性，而是根据他们事实上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来决定其褒贬轩轻的态度的。所以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各个社会阶层的排列顺序常常是“士商工农”，有时更甚至是“商士工农”的，在有些时代，完全倒过来的事情也是有的，如在元代的“九儒十丐”的社会里，便大抵是“商工农士”。中国文化历来对“士农工商”的顺序的强调，对“重农轻商”的政策强调，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实际情况的出入。强调得越厉害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出入得越多的时候。

对于商人凭藉经济实力而对社会观念和经济观念所作的挑战，一般的“农”或“工”当然只有发发牢骚的份儿，可是“士”却不那末容易对付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可进入统治阶层，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文化大权，——在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中，他们也许是唯一有文化的阶层。因而他们也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发发牢骚，他们也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文化特权，利用各种文字和文学形式，对商人进行抵制和反拨，在进行抵制和反拨的时候，他们常常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以全民代言人的身分，尤其是以“农”的代言人的身分立言。

但是，“士”对于“商”的态度，也并不仅仅是轻视或非难。他们也是一些普通人，在基本的人性上和“商”是相通的。“商”的富裕优越的生活，也会引起他们的羡慕；“商”的危险艰难的处境，也会引起他们的同情；“商”对于社会的实际贡献，也会引起他们的肯定。同时，他们作为“社会的良心”，或作为全民代言人的身分，也会促使他们超

越一己的恩怨和利害关系，而对“商”的生活和处境作出复杂多面的反映。这种超越了简单的牢骚与不满的复杂多面的反映，正是使得文学作品具有认识价值的原因。

同 情

在社会各阶层中，商人的地位尽管不高，但它总是个“正当”的阶层，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阶层，而决不是一个寄生的阶层。他们的正当性和对社会的贡献，都是通过辛勤努力而获得的。除了少数巨商大贾可以不劳而获以外，大部分的商人都必须辛勤劳动。他们要吃尽种种辛苦，经历种种危险，还要遭受官府의 欺压，以及失败的风险。对于商人阶层的辛苦，其他社会阶层也有所认识，士人阶层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他们的温厚的同情。

文学作品中经常表现商人的跋涉旅途会遇到多少麻烦和危险，而对此文人们又是如何地同情。比如在宋何承天的《巫山高》里，诗人在描绘了巫山和三峡的险峻之后，又特别提到了“凄凄商旅之客，怀苦情”（《乐府诗集》）。这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南朝的沿江贸易很发达，很多商人活跃在长江流域。在险峻的地段他们大概吃尽了苦头。诗人对此流露出了真诚的同情。

唐代诗人刘驾由于同情商人的危险，特地把传统的《贾客乐》，改为《反贾客乐》。他说：“乐府有《贾客乐》，今反之。”从而以商人的危险作为主题：